



民国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范儿



邵盈午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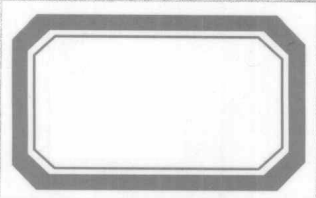
MINGUO
FANR

Fengliu Zong bei
Yuda Fengchui qu

严复云：“物之存亡，系其精气，咸所自己，莫或致之。”
模范系于天生，无此“精气”者，想成“范儿”不可能；
有此“精气”者，不想成“范儿”亦不可能。
“民国范儿”均自然天成，非人力之能左右。



東方出版社



民国 范儿

MINGUO
FANR

Fengliu Zong bei
Yuda Fengchui qu

邵
盈
午

著

東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姚 恋
责任编辑：王一萌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范儿：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 邵盈午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ISBN 978-7-5060-4409-7

I. ①民… II. ①邵… III. ①名人-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IV. 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6336 号

民国范儿：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MINGUO FANR: FENGLIU ZONG BEI YUDA FENGCHUI QU

邵盈午 著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174355

印刷：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经销：新华书店

版次：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数：293 千字

印张：19.5

书号：ISBN 978-7-5060-4409-7

定价：38.00 元

前 言

时间的鑿水以其无尽的深邃意味无声无息地流淌着；对于那些已逝的历史人物，其特殊意义往往会通过时间的维度显示出来。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如果我们把辛亥革命视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那么，对于在这一重大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卓异人物，甚至那些看似离“政治”很远的边缘人物的记忆、追溯、体悟、反思与评说，便在特定时间意义上，构成了新旧嬗替的历史大转型时期的一种精神纪实。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嵩目时艰，扼腕唏嘘，“周邦命正危”的家国之难竟匪夷所思地在民国人物身上发生了奇异的悖反效应，催生出卓异的生命样态和灵智之果，并在那样一个积弱积弊而又孕化生机的舞台上熠熠生辉。遥想当年，风云际会，那一个个“民国范儿”，是何等地凛凛而有生气，朗朗各具风神；纵使苍黄翻覆，世变日亟，他们或以存亡续绝的“一二人”自命，或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相期；或傲岸不群，掉臂径行；或放浪形骸，惊世骇俗；或革故鼎新，开启民智，或悲悯天下，度化众生。功业煊赫，气象正大，须髯飘拂，扪心有温。

可当人类跨入21世纪的时候，随着岁月的流逝，那种令人追慕不已的“非娇厉所得”的“民国范”已渺不可寻。厕身于后现代的语境下，人们普遍地深感某种光明、坦荡襟怀的缺失，一种飘逸、浪漫精神的流逝，某种自由、率真风度的消隐，某种空灵、潇洒神韵的湮没心脏某种至真至善至美至纯的心性的凋萎，并禁不住发出一声声不胜仰怀的慨叹。

2 民国范儿：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而这一声声慨叹，恰好表明某种隐含在时间背影深处的东西并未形迹俱泯，光沉响绝。纵流光如驶，时浪推排，那一个个给后人留下无数惊叹号的“民国范”，其“精气”犹昭然而未失，潜行而不绝，至少存活在当下人们对“民国范儿”的仰怀与追慕之中；穿越时空的藩篱，他们仍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着使高贵激情内燃的柴薪。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清末民初人物，除了前面所说的记忆、追溯、体悟、反思与评说，从而读解出积淀其中的“历史意味”外，如何进一步找到某种与现实“相对应的力量与智慧”，仍然是一个迷人的课题。

本书所论及的18位名人，志业相殊，神貌各异，皆为清末民初活跃在学界、政界、军界、宗教界的重量级人物，笔者无意对其作事无世细的原生态式记录，亦不拟以“学报体”的僵硬面孔在学术圈里独享清高，而是力求纠正被既定模式或“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历史误读，复原那些尘封既久、聚焦模糊的“历史记忆”，彰显其潜德之幽光，弘扬其卓绝之精神，此乃笔者努力文本话语价值的终极指向。由于笔者力有不逮，虑有未周，逞私智而错用心者，皆或难免，恳请读者不吝赐正，以示津梁。

邵盈午于古彭寥兰簃时在庚寅岁杪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 1

林纾：悖逆是民国的一道风景 / 1

一时译名传海内 / 1

拼此残年以卫道 / 4

含谟吐忠 / 9

梁济：忧端颢洞与天齐 / 17

以纯儒自励 / 17

“必将死义，以救末俗” / 21

无理性的理性 / 24

沈曾植：一叶警秋 / 31

硕学通儒 / 32

“道情拯溺平生意” / 36

2 民国范儿：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年年心绪凋残尽 / 39

王国维：昆明池水至今寒 / 43

“独学时代” / 43

要为“浙学”张一军 / 46

蓄辫的“导师” / 57

“自沉”新解 / 59

辜鸿铭：世间不复有斯人 / 67

“顶古怪的人” / 68

“立异以为高” / 73

怒骂声中见至情 / 76

章太炎：铮铮铁骨 浩浩雄才 / 85

“民国称衡” / 85

“乾坤只两头” / 89

一代人文建斗辰 / 95

康有为：托古之心与大同之梦 / 99

“万木草堂” / 99

“六经皆我” / 103

历史的无奈 / 107

梁启超：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 113

“言论界之骄子” / 113

“流质多变” / 119

依违于“从政”与“为学”之间 / 123

以政论带学术 / 128

孰为公死，凛凛犹生 / 135

刘师培：“脚本佳人，奈何作贼？” / 139

学林之异数 / 139

“激烈派第一人” / 143

“变节”竟为两截人 / 147

苏曼殊：亦僧亦俗两风流 / 153

“难言之恫” / 153

披发长歌览大荒 / 157

幽梦无凭恨不胜 / 161

“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 169

黄人：注目天际的那一片奇霞 / 171

“月逼残阳逃地底” / 171

奇人者必有奇事附焉 / 173

文坛怪杰 / 176

“谁是完全人格？” / 178

黄侃：更无真相有真魂 / 181

慨然有澄清之志 / 181

“黄疯子” / 184

4 民国范儿：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一语成讖 / 191

熊十力：“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 195

狂出真性情 / 195

执教上庠 / 199

原创性哲学家 / 203

“中国文化亡了！” / 208

梁漱溟：我们能发出那个大吕之声吗？ / 211

“我生有涯愿无尽” / 211

“为往圣继绝学” / 216

“殉道者”的悲壮风采 / 221

陈寅恪：四海无人对夕阳 / 227

存亡续绝的“一二人” / 228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233

一生负气成今日 / 237

吴宓：争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 245

二马之喻 / 245

“鹃血啼干”赋《落花》 / 249

“多悔”与“无悔” / 254

柳亚子：斯翁毕竟是诗人 / 261

南社中的柳亚子 / 261

“自负”与“牢骚” / 269

“诗人柳亚子” / 277

宁调元：头颅掷处作雷鸣 / 279

铁锁银铛带笑看 / 279

生不逢时甘作殇 / 285

“谭嗣同第二” / 289

陈其美：“吾党之健者” / 291

青帮首领 / 291

以暗杀始，以暗杀终 / 295

“尚力”的局限 / 300

林纾：悖逆是民国的一道风景

对于林纾其人，史墨眷顾最多的，即集聚在他身上的那一系列悖逆性构成：不识外文，却成为清末民初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赞成维新，誓做“共和国老民”，却成为清朝遗老，并以年近七旬的高龄，11次去光绪皇帝陵上祭谒。此类事流传甚广，随便拈举一端，便可成为老先生的一尊名片。以故，在对林纾其人进行评价时，学界使用最多的不外乎“傲慢”、“偏执”、“保守”、“顽固”之类的字眼。

但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放下批判的立场，以一种语境还原的方式，藉“同情之理解”对其进行心态重构，细解民国这一道悖逆的风景。

一时译名传海内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侯人。林氏得享大名，乃至对近代文化史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开启近代翻译西方文学之风。他虽不谙外文，却长于古文，兼擅诗词、绘画、戏曲。从最初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起，直至逝世前，他总共翻译外国小说183种，



林纾像

1200多万字。其中涉及英、美、法、俄、挪威、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作品，译介了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大仲马、小仲马、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等许多世界著名作家作品。林氏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仅凭口译者的口述，即能“耳受手追，声已笔止”，且译笔生莲，灵动传神。尤其是他所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风行大江南北，一时有“外国《红楼梦》”之称。严复在1904年所赋留别林纾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足见其影响之

大。胡适曾盛赞林氏翻译上的成就：“古文不曾做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成百余种长篇小说，并使许多学之之人，亦用古文译长篇小说。古文中本少滑稽之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欧文与迭更司之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伽茵小传》等书。古文之应用，自司马迁以来，未有如此之伟大成绩也！”（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钱钟书回忆他在十一二岁的情形时说道：“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钱钟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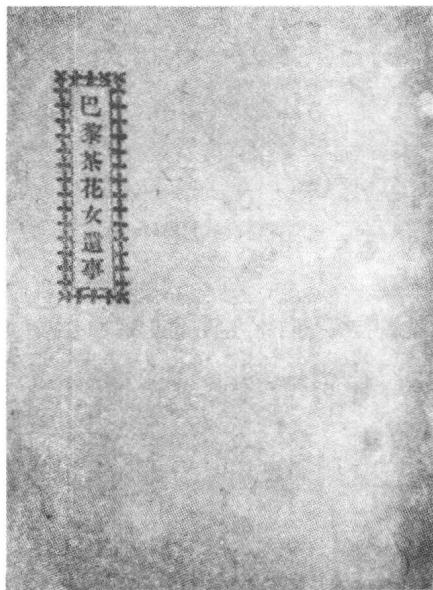
译书虽不同于文学创作，但作为一种主体行为，通过译者所译之书，亦能在一定程度上曲透出译者的文化眼光和主体价值取向。如1905年，为配合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林氏翻译了美国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黑奴吁天录》，在该书跋中，他自谓翻译此书是“触黄种之将亡……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他认为，警醒国人、启迪民智是当务之急，而“西方多以小说启发民智”（林纾：《译林叙》，《译林》1901年第1期）。因此，林氏译介外国小说，多以救亡图存为旨归。

就在林氏译就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风靡海内之时，接踵而来的是庚

子事变。国难当头，林氏深感“衔羞蒙耻，呼天抢地之日”（林纾：《译林叙》，《译林》1901年第1期），应当介绍的是“英雄”而不是“美人”。因此，林氏当时真正想译的是《拿破仑传》，只因史传难译，遂止。但从林纾以后的翻译实践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其翻译内容的选择上，不少与“英雄”有关，如《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拿破仑本纪》及许多“战纪”之类。除此“尚武”题材外，林氏还认为值此民气衰敝之时，宜大力推介“冒险”类的小说，如《鲁滨逊漂流记》、《斐洲烟水愁城录》等，这是中国所缺少的。

林氏在其另一部译著《狼山鬼侠传·序》中曾如是责问道：“西人说部，舍言情外，探险及尚武两门，有曾偏右奴性之人否？”针对中国民气不昌、士风日下的腐败现实，他强烈呼唤引入西方的英雄主义和自由传统。他甚至非常偏爱西方小说中的野蛮血腥气息，以至公然彰扬“贼性”，请听：“至于贼性，则无论势力不敌，亦必起角，百死无馁，千败无怯，必复其自由而后已。虽贼性至厉，然用以振作积弱之社会，颇足鼓动其死气。”（林薇：《林纾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页）

这怒其不争的激愤之语，强烈透露出林氏的一腔血泪真情。应当说，家国之悲，是林氏从事西方小说翻译的初始动力。而偏重悲情的审美倾向，使其对狄更斯、哈葛德等西方作家产生强烈共鸣，他尝谓：“哈氏所遭蹇涩，往往为伤心哀感之词，以写其悲。”（《斐洲烟水愁城录·序》，见《林纾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又云：“迭更司，古之伤心人也。”（《滑稽外史·短评数则》，《林纾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这种俨若从天性中流溢而出的悲情，无疑与他本人的精神样态互为表里。



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
初版本书影

拼此残年以卫道

清廷覆灭清帝退位后，林氏目睹政黯民怨，忧心如捣，尝自谓“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林纾：《畏庐诗存·自序》，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75页），遂以清朝遗老自居，以“圣人之后”自命。其时，际值新文化运动方兴，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倡导者力主废弃古文，改用白话。对此，林氏以为荒悖殊甚，遂欲“拼此残年以卫道”，极力反对以白话文通行取代古文，主张文学仍应“载道”。他慨言道：“天下之理，制器可以日求其新，惟行文则断不能力掩古人。”并进一步强调：

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先儒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林纾：《十字军英雄记序》，见《春觉斋著述记》卷三）

总之，能读书阅世，方能为文，如以虚枵之身，不特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见《文艺丛报》，1919年4月，普通图书馆发行）

持平而论，林氏反对白话文，也并非全无道理。他所强调的是一个文人所必备的厚积薄发的文化底蕴。他尝以韩愈为例，揭橥此旨：

但闻人言，韩愈为古文大家，则骂之，此亦韩愈之报应。何以言之？《楞严》、《华严》之奇妙，而文公并未寓目，大呼跳叫，以铙钹钟鼓为佛，而《楞严》、《华严》之妙处，一不之管，一味痛骂为快，于是遂有此混混纷纷者，尾逐昌黎骂之于千载之后。盖白话家之不知韩，犹韩之不知佛也。（《论古文白话之相

消长》，见《文艺丛报》，1919年4月，普通图书馆发行）

从此一认知出发，林氏痛诋“以古文为朽败”的“俗士”，以为其“轻蔑左马韩欧之作，谓之陈秽，文始辗转日趋于敝，遂使中华数千年之光气一旦黯然而熠”（林纾：《送大学文科毕业生诸学士序》，见《畏庐续集》）。

戟指怒张的林氏因上述种种“不合时宜”之举，无可幸免地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由是笔者不禁想到，近代维新变革的艰难，往往容易使人将每次改革归于失败均归结为改革不够彻底；因此，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急躁心态——似乎任何事情，总是越彻底越好，矫枉必须过正，否则，便斥之为“保守”。仍以文言文而论，似乎反对者即为“进步”，固守者则为“落后”，但事实上，情况却极为复杂，未易一言以断。设若没有深厚的文言根柢，白话文未必就能做得出色。众所周知，鲁迅、周作人皆为白话文的高手，但他们的古文根柢及传统文化的修养，亦俱臻高化之境，此即显例。

一个人厕身在万人侧目的氛围中，也许太清醒于自己的孤独，他自会变得激烈起来，这几乎是历史上所有“怪杰”的通例。在致蔡元培的信中，一向不擅藏掖的林氏，遂将满腔忧愤与郁结一股脑儿地从笔端流泻出来：

……

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挽救之时；便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已，未有不麇沸膺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之论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失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弃灰，今笃老尚抱残缺，至

6 民国范儿：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死不易其操……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齐生于今日，则万无济变之方。……若云成败不可以论英雄，则又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记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啾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为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为国民端其趣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引自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9页）

此真可谓奋袂攘衿、怒目切齿了。而蔡元培在致林氏的复函中则指出：“周氏兄弟（指鲁迅与周作人——引者）所译《域外小说集》文辞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蔡氏毕竟是新学主帅，接到林氏的信后，自感不悦，意在情理之中，回起信来不免语中带刺。不过，透过林氏的上述这番喋喋不休的“卫道”之言，倒是颇能窥寻出身为晚清遗老的普遍心态——他们无法在一种普遍的价值失范和混乱的文化秩序中存活，他不能容忍已融入血脉的古文一朝“声销烬尽”。

为“力延古文于一线”，林氏连撰数文以争“天理”，充分显示出“不汝惧”的非凡勇气。面对强大的舆情攻势，林氏虑及自己因秉性耿直，口无遮拦，曾痛骂过不少与他意见相左的论敌，故主动致函各大报馆，公开承认自己“有过激骂詈之言”，但“吾曹岂可与同群”的强大自信，仍使他毫不畏葸，笔战不已，直至逝世前一日，他已不能言，犹以指于其子林琮手掌上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朱羲霄编：《贞文先生年谱》，世界书局1949年版，卷二，第65页）显示出“拼此残年以卫道”的殉道气概。对此，连他的论敌陈独秀也感叹道：“像这样勇于改过，倒很可佩服！”（陈独秀：《随感录·林琴南很可佩服》，《每周评

论》第17号，1919年4月13日）在陈氏看来，倒是那位自命不凡的康“圣人”（有为），一面主张一夫一妻，另一面却又纳妾；一面大言人类平等，另一面又好设婢仆，有些假圣人的样子。

那么，时至今日，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当年有关白话与文言的那场激烈论战呢？笔者认为，白话文运动无疑是一场功绩卓著、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运动。从政治层面看，白话文与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进行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合成一种文化革命，又与在科学、民主的旗帜下所进行的反封建主义运动合成一种思想革命。在白话文运动中，倡导者

们那种全盘否定传统的倾向也确乎反映出一种冲决罗网的可贵自觉：他们清晰地看到，有着几千年积累的传统文化，并非一个简单的戳记，而是一个通过文言文的记载所构成的有形的符号世界，它那种经过千百年层层积淀而凝结在一个民族的个体逻辑思维的水平面下边的巨大的“潜意识冰川”，制约着整个民族的生存—文化空间，甚至制约着那些振奇越世之士对传统文化及自身的省察。因此，我们完全理解白话文运动的闯将们那种极端的立场——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文言形式与新的价值观念、审美要求之间所存在的尖锐矛盾，紧紧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以一种“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陈独秀语）的斩钉截铁姿态，对文言文大施挞伐，显示出白话文运动的健将们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相比之下，林氏则站在一个古文家的立场，其种种言论，皆出于“卫道”的热忱，虽然在学理上不无道理，但终因与现实的隔膜而遭到世人“落伍”



林纾（右）与《上海白话报》创办人林白水